

论明代明诗总集的编纂特色

潘林

(肇庆学院 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明代明诗总集的编纂逐步繁荣,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获得长足的提升。这时期的明诗总集虽然庞杂,但是总体编纂特色则是鲜明的,其中突出表现在地域性、群体性、商业性和教化性四个方面。它既具有传统诗学编纂中所要求的审美特性,又具有所处时代鲜明特点,从而迎合了明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求。因此关注明诗总集的编纂对明诗研究极具开拓意义,更是为未来的深入考量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明诗总集;地域;群体;雅正;商业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7)02-0076-07

明代明诗总集的编纂历程呈现逐步繁荣的态势。明初总集数量不丰,卷数少,如《姑苏杂咏》只有上下两卷,编选诗人两位(高启、南老),计 143 首。^[1]篇幅稍长点的《皇明西江诗选》十卷,共收录洪武至正统年间 87 位江西诗人的 1000 余首诗歌,平均每人也不到 12 首。^[2]中期以后,编纂的总集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仅弘治、正德、嘉靖和隆庆四朝所编刻存世的明诗总集就近百部,编选的则更多。《诗学权舆》22 卷已为前期含量丰富的诗歌总集,后期则远远超越了这一规模。《盛明百家诗》录有 100 多位诗人诗歌 324 卷,《石仓十二代诗选》现存的都有 818 卷,可见其丰富的程度。另外,后期编纂的总集更严谨,系统性更强,体例逐渐多层次化,主要以流派、地域、文体、人物、性别和历史事件等来分类选录诗歌,不再像前期仅以人标目。明后期诗歌创作和编纂持续高涨,总集刊刻也达到高潮,如论者言:“万历以后,雕版印书事业更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一时士大夫们竟以刻书为荣,有的搜罗古籍秘本,校刻行世,以示自己的博雅;有的刊刻家集,宣扬祖德,以示门第高贵;也有剪裁旧章,集句类编,以利考场应试;又有选辑诗文,施加点评,以供揣摩。”^[3]

纵观如此庞杂而又丰富的明诗总集研究资料,

可惜当前学界研究此领域才开始起步,更为重要的是总集所承载的文献、诗学价值还是多方面的,因此对总集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开拓性。正如鲁迅所说:“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4]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论说明诗总集编纂特色,为后期研究奠定基础。

一、彰显文化的地域性

明代地方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区编纂的明诗总集就越多,如江浙有宁波《四明文献》、长洲《文氏五家诗》、昆山《昆山杂咏》、海盐《盐邑艺文前编》、湖州《吴兴艺文补》等大量吴地诗歌总集。皖南徽州、宣州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一些大家族逐渐显现,例如程氏、汪氏、汤氏家族。经济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诗文总集的编纂也在此地早就得到关注,如程敏政《新安文献志》、汤宾尹《宣城右集》、李敏《徽郡右集》、陈有守、李敏《徽郡诗》、梅鼎祚《宛雅》等。地域文化的发达则直接促进地方总集的编纂,例如闽中地区在明初即有“闽中十子”派,之后又有“晋安”一派,明晚期即编有袁表《闽中十子诗》、徐熥《晋安风雅》、邓原岳《闽诗正声》等。张九龄自唐便开岭南诗派,明时岭南编有张邦翼《岭南文献》、谈恺《广中五先生诗集》和李元弼《江皋小筑

[收稿日期] 2016—12—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明代七子派接受史研究”(12YJA751051);肇庆市 2015 年度社科规划项目(15ZC—07)。

[作者简介] 潘林(1975—),男,安徽舒城人,讲师,文学博士。

集》等。其他诸如两湖和巴蜀地区都有较为丰富的地方诗文总集出现。著名景物、建筑带有较多的人文内涵,因而这些地方留下了大量的诗文,明代对此亦作出编录出版,如陈克昌《麻姑集》即言,“麻姑山为建昌所属,唐颜真卿《仙坛记》后题咏滋多,克昌因汇成此集”,^[5]田汝成、蔡汝楠编《武夷游咏》“二人因偕游九曲,各成五言古诗十首,编为一帙。”^[6]其他同类总集还如黄焯《浯溪诗文集》、冯子京《桃花源集》、李觉斯《南滁会景编》、董遵《滕王阁集》等。

明代地方诗歌总集总体而论其水平不及全国性诗歌总集,特别是不及名家编纂的名家诗歌,但地方总集有其鲜明的特点及价值。这类总集虽为区域诗歌,却能全面反映明代整个底层社会面貌,而且比全国性总集更具有优点,更能够细化。例如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其分类十分详尽,前 46 卷涉及都邑、城池、学校、社学、义塾、风俗、令节、公廨、仓场、馆驿、古迹、坛庙、书院、祠庙、第宅、山、水、水利、土产、果、花卉、食品、徭役、道观、寺院、桥梁、坟墓。其中以学校、祠庙、山、水、寺院、坟墓为重点,反映出当时社会在这几个领域的重视。徽州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所论撰分神迹、道源、忠孝,儒硕、勋贤、风节、才望、吏治、遗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列女、方技十五目,其中有应考订者,敏政复间以己意参核,而附注之征引繁博,条理淹贯,凡徽州一郡之典故,荟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德藉以考见。”^[7]本部总集时间跨度大,从南北朝以后开始记录,将诗歌内容分为十五目,最主要的是程氏在总集中对诗文作出详细考订,可以说极具有地域文献价值。再看张应麟编《海虞文苑》,其收录文体繁多,包括赋、古诗、杂体、奏疏、书牍、记、序、传、议、志铭、祭文、墓表、行状和杂著,诗歌主要记录乡人交往、及生活的点滴。^[8]^[1]只是《四库总目》对以上这种全面收录地方诗文的编纂方式多次表示反感,这样评论《海虞文苑》:“特时代既近,牵於乡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滥收。盖凡辑一乡之文者,均不免此失,亦其势然也。”^[9]^[2]又评价岭南张邦翼《岭南文献》说:“於岭南诸集,搜辑颇广。然明人著作,百分之中几居其九焉。盖时弥近而所收弥滥,亦明季标榜之习气也。”^[10]^[3]因此馆臣认为地方诗歌总集虽搜辑范围广,但其缺点在于收录弥滥,而其根源便是标榜本地区的习气。

明代地方总集的编纂充满乡土情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地方名人诗集的整理出版,以彰显本地的物华天宝。如吴县刘昌官居河南,编

有《中州文贤名表》,主要选录许衡、姚燧、马祖常、王恽、许有壬和富珠哩翀六人诗,前文分别有宋荦、刘昌和汪立名序,称赞中州人杰地灵,并说:“夫诸贤之文其行世如河洛之行地,人固无有御之,岂必冒之能表著哉?”^[11]在序言中赞扬六人之文如河洛行地的地位,认为无人企及,评价不可谓不高。第二是总集编纂者对地域的直接赞美。陈以诚在董斯章所编《吴兴艺文补》中对吴兴作出说明:“吴兴为江左清乐之国,六代名贤至从人主上章请郡风流,政绩焜耀湖山,而文事亦日以富有。”^[12]他主要从地理位置、历史人物、政治和文化几个角度赞美吴兴。陈禹摸在《海虞文苑》序里也说:“吾邑负山带湖,还以瀛渤,信明秀之胜区而人才之林薮也。”他是从地理位置和历史人物两个方面作出赞美,并认为此地文化发达,只是“历岁绵邈,散失为多,寢久寢湮,良是惋惜。”^[8]^[1]其他类似如《锡山遗响》序言:“锡之为邑在三吴间,山水清丽丰旷,生其地者多沈雅秀整,以文名家,代不乏人,诗文之一也。”^[13]《晋安风雅》序言:“不论穷达显晦,皆因诗采拾,以彰吾郡文物之美。”^[14]

明代地方总集中含有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文献,对研究明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编纂者对此也指出其价值所在,谢铎《赤城后集》序言:“姑用以存吾邦之文献之□,以终太守公作志之意,庶后之人,有徵焉。”^[15]邵宝在序言中称《锡山遗响》为“良史”:“志所载借出乎作者之撰附会假借,率无以徵乎其实,而兹集者诗以氏分,氏以世序,由词以知其人,而风化亦著是,岂非邑之良史哉。”另外,这种文献价值也包含了景点诗总集的编纂,这在所有此类总集中皆有明确体现,举《滕王阁集》例,总集收录的诗歌所记录的事件为“乙丑春因偕僚佐饯别寻登酒数行,各适所兴,以夹以壶以琴者,潇洒脱落,恍若神游八极,不可以以世鞅羁也。”^[16]^[2]而记录的目的就是记录整个饮酒赋诗的过程,以备后人所了解当时之盛况:“物理在天地间,聚则散,久则敝,不有以裒集而锓传之,则作者之意荒矣。殆非古人重惜斯文之义也,遂以锓梓之。”^[16]^[2]李嗣京编《滕王阁擅集》等皆类似。

二、侧重求同的群体性

明代明诗总集所收录的诗人具有群体性。复古派对明代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明中后期编纂的总集多以此为中心,首先有复古派收录本派名家的诗歌,如李攀龙编选《古今诗删》、《白雪楼集》等。《古今诗删》五言律诗共选 59 位明代诗人诗歌 255 首,其中同期诗人所占比例约为 53%,诗歌所占比

例约为 83%；七言律诗共选 74 位明代诗人诗歌 198 首，其中同期诗人所占比例约为 62%，诗歌所占比例约为 83%；五言绝句共选 30 位诗人诗歌 70 首，其中同期诗人所占比例为 50%，诗歌所占比例约为 66%；七言绝句共选 58 位诗人诗歌 183 首，其中同期诗人所占比例约为 59%，诗歌所占比例约为 76%。另外，收录的明同期诗歌除了编纂者李攀龙诗歌未有收录之外，其主要诗人均属前后复古派人物，例如收录李梦阳各类诗体诗歌 63 首，收录何景明各类诗体诗歌 59 首，收录王世贞各类诗体诗歌 73 首，其他如谢榛、王廷相、徐祯卿、宗臣等均有收录。而《白雪楼集》主要选录李攀龙与友人赠答唱和之诗，涉及的对象以后七子为主，因此与《古今诗删》又有互补关系。

另外，当时诗坛其他编纂者也随复古之大流而编纂复古派诗歌，例如孔多炤《友雅》、杨二山《弘正诗抄》、徐泰《皇明风雅》和俞宪《盛明百家诗》等。俞宪诗学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复古理论的诗学接受观，从收录明代诗人和诗歌数量来看，《总目》曾指出俞宪对复古派诗歌的收录在《盛明百家诗》中占有重要比例，按照其诗集小序对作者简介的整理归纳，收录最多的为嘉靖时期的 1532 人。^[17]俞宪诗坛活跃的时间主要在嘉靖年间，这一时期正是唐宋派、后七子派主导诗坛，而此时的俞宪不仅与众多复古派诗人成为朋友，也因此受到影响而肯定复古派诗歌理论的价值，他收录绝对多数嘉靖时期复古派诗歌即是对其诗学地位的认可与接受。再如《弘正诗抄》以前七子诗歌为主要选取对象的，所录凡李梦阳、何景明、康海、薛蕙、徐祯卿、郑继之、王廷相、边贡、孙一元、殷云霄十人之诗。曹忭在序言里认为诗歌需要“规范程度”，名家杜甫、李白皆然，因此对七子派特别是李梦阳提出的重格律诗论给予正面肯定，并高度评价七子派：“体裁格调声律音响要皆根本汉魏，斧藻隋唐，譬之般倕，虽不离规矩以为方圆，而匠心独运，各臻厥妙者”，^[18]这样的论述显然与七子派诗论相同，选录者杨二山与七子派亦相似，他的诗歌理论核心即是要求先格调次声响。当然，正因为复古思潮在明中期整个诗坛的影响，各个诗歌流派及其理论对诗歌格律要求更加明确，黄溥《诗学权舆》则对诗歌创作提出更为细化的诗法规范，他在序言中从格律、命意、用韵等角度谈诗法。^[19]

晚明诗坛持续倡导复古，他们欲以经世致用挽救衰亡的明王朝，复古派编纂的总集亦为丰富，最为著名的为陈子龙《皇明诗选》，另外还有夏允彝

《几社六子诗》，杜骐徵《几社壬申合稿》，夏完淳《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其他派别亦编纂有诗歌总集，如袁表、马荧《闽中十子诗》收录的均为明初福建闽派诗人，此派诗歌后世影响很大，如四库馆臣所言：“闽中诗派以十子为宗，厥后辗转流传，渐成窠臼，其初已有唐摹晋帖之评，其后遂至有诗必律，有律必七言。”^[20]

明诗总集编纂的群体性除了注重流派诗歌的选录，还注意对特殊群体诗人诗歌的整合。例如总集编纂突显女性诗歌，田艺衡《诗女史》在序言里就批评前代编者将入选女性诗歌存于宫词的偏见：“夫宫词皆得列于葩经俚语淫风，犹不删于鳞笔，盖美恶自辨，劝惩攸存非。惟可考皇猷，抑亦用裨阴教其功茂矣，岂小补哉？”^[21]^[686]他认为女性诗歌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将其列在“宫词”，而其中又都是一些“葩经俚语淫风”，相较《诗女史》而言田氏则将女性诗歌作为专门的选录对象，并以“史”的名称冠名，而且还如他所言可以续史：“我朝作者固多，而传者不可备得，今偶录所见，余惟好事博览者成之当为续史。”^[21]^[687]《诗女史》所编选明代诗完全不以身份贵贱分类，这在当时社会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挑战。明中期对女性诗歌的选录成果并不明显，却为晚明女性诗歌编纂的兴盛吹响了前奏。

晚明时期则将女性群体诗歌细化，分类专录，成果可谓丰厚。这时期编纂女性诗歌涉及各类女性，但无一例外都肯定了女性诗歌在诗坛的地位和影响。其中有专门收录被传统礼仪伦理奉为典范的女性诗人，例如赵世杰《古今女史》，赵濬在序言里首先认为“昔司马光尝谓风化之原本于男女，易以阴阳合德为中和之至。讵谓女史可偏废乎？譬之天道，如歉于飞霜冷露则四时元气不周，地道废弱税柔泉，则五行运化有阙。”他认为男女阴阳调和，缺一不可，男女诗歌亦是如此，另外又指出女性诗歌的史学和社会意义“命之女史，盖与史乘，共昭合德之义俾天下，后世晓然知女学士犹胜须眉，妇人哉，其于风化之原，未必不无少补云。”^[22]叶绍袁《午梦堂集》则是一部专选其妻女的诗歌，他在序言里也强调了女性有才学的意义“丈夫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23]^[3]出版者曹学佺在序言中肯定其德、才、色三者具有的价值，但表示出对失节女性诗人的否定“闺秀诗唐人故不能多，惟杨盈川侄女有《妆成书怀》一首，其余若李季兰、薛玄度、花蕊夫人皆琐尾失节之人，不足道也。”^[23]^[3]其他与此类似的还有周履靖编《古今宫闺诗》、郭炜编《古今女诗选》和周之标《女中七

才子兰咳集》，值得一提的是周之标还是晚明著名的女性出版家。

总集还对青楼女性诗人有所关注。朱元亮《青楼韵语》，所录诗歌前还载有《嫖经》，将《嫖经》等同于其他经文并作比较，序言中玄度子说“《嫖经》者如大禹铸九鼎，以图神奸，使民不逢不若，此正与道学相发明，安得谓其有异耶，不特此也，且可以助道学所不及，何也？”^[24]他将《嫖经》用大禹铸九鼎作比喻，又将其与道学作等同，可谓是对传统理学的挑战。钟惺《名媛诗归》、《历代名媛诗摘抄》，郑文昂《古今名媛汇诗》，周公辅《古今青楼集选》等也都收录青楼女性诗歌。

就僧侶诗而言，明初释梵琦编《三圣诗集》，至此后近 200 年无人再对僧侶诗作选录编纂，晚明僧侶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融入社会，僧侶诗亦受到关注，这时期编辑的僧侶诗总集有释正勉等编《古今禅藻集》最为著名，“所录皆释子之作，而不必有关于佛理，曰禅藻者犹曰僧诗云尔。所载上起晋支遁，下起性通”，^[25]计 377 位僧侶的 2824 首禅诗，其中明僧侶诗 12 卷，内容并非涉及佛家经典，而是以抒情咏怀，酬答应对和奇闻异事为主。只是四库馆臣在提要中指出其疏漏、泛滥、缺乏考订、不纯等缺点。另一部僧侶诗歌总集为毛晋编《明僧弘秀集》，其编纂承袭《唐僧弘秀集》，是书共录 171 年间（洪武元年至正德 16 年）197 位僧侶的 1700 多首诗歌，“本书的形式特征，除诗僧的排列顺序也是大致依时代前后外，较特别的是置各家小传于所录诗末，而且小传又不单述诗僧履历，同时也记取材来源、考辨该僧别集版本与诗作真伪，由此使本书在内容方面具有了相当的学术价值。”^[26]除此之外还有石万程《诗禅》和吴应宾《圣僧庵集》等其他僧侶诗总集。

三、谋求利益的商业性

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明诗总集编纂呈现出商业化特征。商业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交流，社会对前代和当代诗歌需求量日益扩大，出版商为了进一步扩大阅读者范围，开始逐渐编纂较为通俗化的诗歌总集，这时期不仅出版多部著名的长篇小说，而且还对具有“雅正”特性的诗歌作出注解，最终促使总集出版既迎合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也更有利于诗歌走进普通市民阶层。这时首先出现的是对名家诗歌注解的总集，例如针对明中期影响巨大的七子派就先后推出多本诗集注解。万历年间，李廷机考正李攀龙等后七子诗，并辑有《新镌翰林考正国朝七子诗集注解》和陈继儒句解，李

士安补注明刻本《新刻陈眉公考正国朝七子诗集注解》。举后者为例，本集收录后七子诗，卷一第一首诗歌收录李攀龙《送赵户部出睢阳》，首句为“仙郎起草汉明光”陈继儒解释十分详尽，浅显易懂：“汉官仪尚书郎，主掌文书起草。明光，宫名。”第二句“几载军储事朔方”，显然这句“朔方”一词难理解，而陈氏即注：“朔方，今改为宁夏卫。”第三句“五马新为淮海郡”，陈氏又注：“汉官仪朝臣出使驷马为郡守，增一马成五马”。^[27]通过系列注解可以在掌握汉代礼仪的基础上更加了解于鳞诗歌的内涵，这就更有利于普通市民阶层对诗歌的总体把握。

当时出版界不仅印刻前代大家诗歌范本，还出版当代名家诗歌作品或精选诗歌注释。考虑到当代名家诗歌收录量大，因而编纂者进行选录时又挑选符合市民口味的诗歌，并冠名曰“精华”、“诗选”、“类选”等总集名称。前者如唐文献、朱国祚和焦竑辑评四卷本《新刻精选当代台阁精华》，即是对当代台阁名家诗歌选录并作点评的总集。后者如舒芬辑，舒深增补八卷本《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此本所录上自战国宋玉，下至明代，“分门定类”选录明代作家 119 人，其中包括帝王将相和各阶层社会名流。《玉堂诗选》亦追求可读性，陈栋在序言曰：“皆得《三百篇》之旨，灼见其发之性情，止于礼仪，悲而不伤，忧而不怨，温厚和平之音溢于言表，品题风物之情见于言外，其于养性淑身，诚哉有赖也。”^[28]显然陈栋认为此集深得《三百篇》之精髓而有利于“养性淑身”。另外，出版界还推出含量小，利于儿童阅读的理学诗歌《养蒙诗》，共选录“宋儒及昭代诸理学五、七言绝律共一百八首”。^[29]

这种商业化读物的推进还包含对具体诗体的整理搜集和评论以满足对社会的俗化需求。晚明商业发展冲破了传统礼仪的束缚，在新伦理没有确立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将人类物性反映的更为透彻，于是出现了大量直接抒发情色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总集编纂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竹溪主人《丰韵情书情词情诗》则是代表。此集卷首言总集为坦然生评，南阳居士评阅，6 卷目录分别为室家、金兰、青楼、幽闺、情调和情诗，其中前四卷记录书信，情调卷录《草堂诗余选》中历代女性及男性的思情、闺情之作；情诗卷录《古今诗集选》中离别闺怨诗词。坦然生言：“顾情而不达，以书何以语情，情书而不表以情，何以语情书。兹编室家好矣，金兰递悃矣，青楼与闺帏通殷勤矣，一纸素笺露出五丹悃寸心，微意写来满眼娴辞，其丰韵之洒洒，真如蝶之恋花，鱼之乐水也，是用杀青之，以怡风流者眸睫。”^[30]序言

中他强调情书、词和诗对传递各类情感的重要性以及选录作品对情感表达的价值,最后还指出此书编纂的目的“以怡风流者眸睫”。

另外,馆阁文学自明中期受复古派打击之后便一蹶不振,晚明则编纂有关于科举诗和馆课的诗文。明初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科举应制及馆课诗文的编纂没有过多关注,万历开始诗坛诗歌编纂逐渐涉入此领域。如明清之际吴汶、吴英辑《历朝应制诗》,此集编选应制诗上自魏,下讫明,但五代以后并未刊出,卷首钱谦益序未作过多论述明应制诗,吴汶、吴英在《凡例》中说:“是集选以历朝者,盖欲博探古今之风气,并稽世代之盛衰,自汉魏六朝及唐宋元明,其间声调固是不同,而体式亦为极备,更际当代文明,衡文者间以课士,可谓千秋盛美先后同揆矣,愿期海内同声共讐不朽。”^[31]显然他编纂的目的不仅要体现世代之盛衰,更有“衡文者间以课士”学习目的。还如陈经邦编《皇明馆课》,按其《凡例》言所录各类馆课文体:“编中世代起嘉靖乙丑,止万历丙戌,凡六科。”并言其目的“综核经世抒写性灵各有旨”。^[32]

由此看来,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明诗总集编纂经过了明代二百多年的发展,除了关注对诗歌创作的审美研究,还积极追求迎合市民口味的商业化利益。如《总目》言:“至万历以后,侩魁渔利,坊刻弥增,剽窃陈因,并无门径可言。”^[33]

四、崇尚雅正的教化性

《振鹭集》序言:“夫振鹭之诗,周人为二王之后作也,圣系实出有殷而国家崇象之典,视周有加焉,赠言之作,诚有合于诗者,且诗人首赋其容貌之修整,继期以声誉之有终,美不忘规。古之道,固然也。”^[34]陈镐在这里就是强调诗歌编纂具有的教化本性。诗歌教化性离不开对雅正的追求。《毛诗序》言诗有六艺:“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并定义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于神明也。是为四始,诗之至也。”^[35]就是说诗歌的本质属性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风雅既是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又是教化的治世之音表现。苏伯衡《洁庵集序》言诗:“至于诗,则出于性情,而不窘于畦町,有优游咏叹之思,风、雅、骚、些之遗”,^[36]这是要求诗歌创作可以不局限于律法,以性情为基础继承风雅教化之旨即可。

明开国之初,诗坛针对元朝绮靡之风的冲击开始倡导恢复风雅和复古意识的文学风气。杨士奇《沧海遗珠集》序言中说“我国家文运隆兴,诗道之昌,追古作者,选录者不啻十数家”“余阅其诗大抵清楚雅则,和平宛丽,极其趣韵”,^[37]现存最早的明诗总集《雅颂正音》虽为治世之音,但更开启了明初诗歌学风雅之思潮,宋濂序言:“其曰‘雅颂’者何?雅则燕飨会朝之乐歌,颂则美盛德、告成功于神明者也。今诗之虽典,雅颂不同矣,犹袭其名者何?体不同也。”^[38]宋濂认为风雅颂乃治世之正音,编纂目的既是将当朝建国之伟业告于神明,又是继承诗歌创作的本质倡导正风雅的作用。宋濂追求对继承古诗风雅的开拓与创新,他认为“今不得为古,犹古不得为今”,但是这种不同仅仅是外在表现,诗歌内在的本质特征风雅不变,于是只有继承诗歌风雅精神诗歌才能达到其本身作用。因而,明初正风雅的诗歌思潮从表面上看是对洪武朝的歌功颂德,实际则是呼唤诗歌本质属性的回归。正如《总目》这样论述明初“要其春容谐婉,雍雍乎开国之音,存之亦足以见明初之风气也”,^[39]其实这正是明初开国之音的主流,对风雅的提倡也是传统诗歌理论创作的审美标准,如《总目》在评价总集《广州四先生诗》时说:“然粤东诗派,数人实开其先,其提倡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故存之以著其概。”^[40]明初《皇明西江诗选》也对诗歌具有风雅特性和教化目的有深入论述,如韩壅所言:“若是编之选,其所以吟咏性情,纪述事物,颂歌太平,虽体制不同,而皆温厚和平,沨沨乎治世之音,有以见风俗之美、教化之隆,与夫列圣功德之盛,皆非近世所能及。”^[41]

明中期,明诗总集继续强化诗歌醇雅的审美教化特征。对诗歌创作风雅的关注仍是这一时期的重点,以“雅”命名的就有《皇明风雅》、《友雅》、《国雅》等。以顾起纶《国雅》为例,《国雅》在凡例中鲜明指出其诗歌选录的雅正标准。“得性情之正,斯雅在其中矣。杨雄亦云:诗人之赋典以则。则也,正也,非雅之谓与?余也采方国之盛音,纂明代之正始,乃祖述二三子者,于是乎名知曰《国雅》。”^[42]顾起纶在凡例中解释了总集命名为《国雅》的缘由,要求诗歌得性情之正,另外还引杨雄所言“诗人之赋典以则”,而方国之盛音正符合这一标准,也是顾氏选录明诗的标准,即诗歌要做到雅正。顾起纶在凡例中还赞扬弘、嘉期间的明之盛音也是倡导风雅形成:“至弘、嘉间诸名公作而大畅风雅,此明之盛音也。”^[42]除《国雅》选录诗歌有此标准外,王世贞在《古今诗删》更是明确提出李攀龙的删诗的特点:第

一，在于删诗者所删对象主要为“风”，对雅颂一类诗歌则收录“百固不能一二”；第二，于麟所录诗歌符合孔子之删诗标准“能工于辞，不悖其体而已，非必尽合于古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兴观群怨之用备而后谓之诗”^[43]，另外，还有编者在总集中对所选诗歌作出评论体现出对诗歌雅正的重视，例如俞宪《盛明百家诗》赞扬孙山人诗：“空同李氏称其风神藻雅，又谓其诗多慷慨悲壮之音，殆然矣。”^[17]借空同之言论其诗歌风神藻雅，又借顾璘和杨仲弘言肯定王少泉诗：“又曰诗诸体皆工，雅而畅，华而有思。杨仲弘曰取材于选效法于唐，此之谓也，斯言殆近之矣。”

地方诗歌同样追求雅正特性，虽然选录没有全国性诗歌总集严格，但是对诗歌风雅教化还是提出很高要求。如屈大均《广东文选》言：“是选中正和平，咸归典则，于以正人心，维风俗，而培斯文之元气。”^[44]他直接指出选录诗歌“中正和平”，“咸归典则”的目的是正人心，维风俗。《晋安风雅》不仅以“风雅”命名，而且对晋安之地的诗作出严格取舍，“至于野狐外道格律者稍畔者，虽有梁窦之权，不敢滥厕片语，为雅道蠹贼。”视那些有违传统社会风雅的诗歌为蠹贼、野狐外道。其所收录的也必须声调尔雅，情采适中才行：“但取其情采适中，声调尔雅，词足千古，体成一家者，得二百余。”^[45]俞允文在《昆山杂咏》中强调诗歌对社会教化的重要性，并说：“（诗）取之以观民风，察五化，示惩劝，端教本，古者诸侯交接邻国必称诗以喻志，是欲以微言相感而别其贤不肖徵盛衰也。”^[46]在论述中，俞允文按照传统社会的诗教思想指出诗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明代明诗总集数量丰富，在整个诗歌编纂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它既有传统诗学编纂中所要求的审美特性，又具有所处时代鲜明特点，从而迎合了明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求。随着诗歌编纂和出版热潮的掀起，清代延续并借鉴明诗总集编纂的经验，不仅编有大量清诗总集，而且还有更多诗歌总集将明诗与清诗合编成册，这就为我们对明诗选本的后期研究提供了延伸空间，也促使我们能够将明诗选本的接受和传播理清思路。

〔参 考 文 献〕

- [1] 周希夔、周希孟. 姑苏杂咏[M]. // 四库全书存目丛：卷 290. 济南：齐鲁书社，1997：120.
- [2] 韩阳. 皇明西江诗选[M]. // 丛书集成续编：卷 149. 上海：上海书店，1994：615—781.
- [3]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104.
- [4] 鲁迅. 集外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14.
- [5] 陈克昌. 麻姑集[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 304. 济南：齐鲁书社，1997：86.
- [6] 永瑢、纪昀. 《武夷游咏》摘要[M]//四库全书总目：卷 192. 北京：中华书局，1965：1748.
- [7] 程敏政. 新安文献志[M]. // 文津阁四库全书：卷 459.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11.
- [8] 张应麟. 海虞文苑[M].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 118.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 [9] 永瑢、纪昀. 《海虞文苑》摘要[M]. // 四库全书总目：卷 193. 北京：中华书局，1965：1766.
- [10] 永瑢、纪昀. 《岭南文献》摘要[M]. // 四库全书总目：卷 193. 北京：中华书局，1965：1758.
- [11] 刘昌. 中州文贤名表[M]. // 文津阁四库全书：卷 459.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2.
- [12] 董斯章. 吴兴艺文补[M]. // 续修四库全书：卷 1678.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
- [13] 邵宝. 锡山遗响[M].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 118.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623.
- [14] 徐熥. 晋安风雅[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 345. 济南：齐鲁书社，1997：376.
- [15] 谢铎. 赤城后集[M]. //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卷 114.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205.
- [16] 董遵. 滕王阁集[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 301. 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7] 俞宪. 盛明百家诗[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 304. 济南：齐鲁书社，1997：109.
- [18] 杨二山. 弘正诗抄[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 301. 济南：齐鲁书社，1997：78.
- [19] 黄溥. 诗学权舆[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卷 292. 济南：齐鲁书社，1997：5.
- [20] 袁表、马茨. 阖中十子诗[M]. // 文津阁四库全书：卷 458.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93.
- [21] 田艺衡. 诗女史[M].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卷：321. 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2] 赵世杰. 古今女史[M]. 崇祯元年刻奇阁刊本.
- [23] 叶绍袁. 午梦堂集[M]. 上海：上海杂志社，1936.
- [24] 朱元亮. 青楼韵语[M]. 上海：同永印局，1914：1.
- [25] 释正勉等. 古今禅藻集[M]. // 文津阁四库全书：卷 473.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
- [26] 陈正宏. 明诗总集述要[J]. 古典文学知识，1997(1)：108.
- [27] 李攀龙等撰，陈继儒句解. 新刻陈眉公考正国朝七子诗集注解[M]. 1689 年和刻本.
- [28] 舒芬辑，舒深增补. 新刊古今名贤品汇注释玉堂诗选[M]. 明万历七年金陵唐氏富春堂刻积秀堂，达德堂重修本.
- [29] 范涞. 养蒙诗[M]. 明万历刻本.
- [30] 竹溪主人. 丰韵情书[M].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2.
- [31] 吴汝，吴英. 历朝应制诗[M]. //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卷 54.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9.

- [32] 陈经邦. 皇明馆课[M].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 卷 48.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6.
- [33] 纪昀等编.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685.
- [34] 陈镐. 振鹭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卷 292.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673.
- [35] 毛苌传述, 朱熹辨说. 诗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2.
- [36] 苏伯衡. 苏平仲文集[M]卷五.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 卷 36.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1: 511.
- [37] 沐昂. 沧海遗珠[M]. //文津阁四库全书: 卷 458.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779.
- [38] 刘仔肩. 雅颂正音[M]. //文津阁四库全书: 卷 458.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79.
- [39] 永瑢, 纪昀. 《雅颂正音》提要[M]. //四库全书总目: 卷 189.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713.
- [40] 永瑢, 纪昀. 《广州四先生诗》提要[M]. //四库全书总目: 卷 189.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714.
- [41] 韩阳. 皇明西江诗选[M]. //丛书集成续编: 卷 149.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616.
- [42] 顾起纶. 国雅(凡例), 万历奇字斋刻本.
- [43] 李攀龙. 古今诗删[M]. //文渊阁四库全书: 卷 1382.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3.
- [44] 屈大均. 广东文选[M]. 四库禁毁丛刊: 卷 136.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129.
- [45] 徐熥. 晋安风雅[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卷 345.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376.
- [46] 俞允文. 昆山杂咏[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卷 315.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2.

(责任编辑:程晓芝)

On the Compiling Features of Collections of Ming Poetry

PAN Lin

(Xiji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52606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compilation of Ming poetry has been thriving gradually,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which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lthough collections of Ming poetry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numerous and jumbled, they reflected unique features, which focused on localization, groupment,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citement. It not only contain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required by traditional poetry collection,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its times, which caters for the demand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M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focus on compilation of collections of Ming poetry has a pioneering significance studies on Ming poetry and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Collections of Ming Poetry; Localization; Groupment; Elegance; Commercialization

(上接第 28 页)

Confucius's Idea of "Cherishing Lives"

MA Yu-l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Humanity is the core of Confucius's idea of "Cherishing lives", which consists of "Cherishing yourself", "Cherishing the society" and "Cherishing Nature". "Cherishing yourself" advocates that people should maintain harmonious heart, keep peaceful and calm mental state, cope with their own problems properly as well. "Cherishing the society" considers 'humanity' a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takes 'propriety' as the security. It pursues the harmonious condition through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Cherishing the society" is the principl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with people or the society. "Cherishing nature" means revering Nature, respecting Nature, and integrating into Nature, through which harmonious unification of human and nature can be achieved. As the resource of our spiritual wealth, Confucius' idea of "Cherishing live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onducting us to solve a lot of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Key words: Confucius; Living Lives; Cherishing Lives